

本体安全与共同安全：外部行为体 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安全共同体建构^{*}

王弘毅 李卓帆

【内容提要】 西巴尔干地区因外部行为体干预与种族纷争，多个主体民族之间陷入无法和解的安全困境，导致流血冲突不断。由于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间接影响“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安全，欧盟和北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就分别通过军事性、规范性压力和强制力量深度介入该地区的领土与种族纷争，试图将该地区国家纳入到安全共同体之中，但这种政策实践并未取得实质性成功。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波黑等国边界两侧同一民族的认同与地位问题引发的本体安全焦虑成为西巴尔干地区种族纷争的根源。这一本体安全焦虑长期压倒建构安全共同体所必需的共同安全焦虑，使地区国家无法达成广泛共识，进而导致安全共同体建构缺乏必要的促发条件。为验证以上假设，本文使用过程追踪法，对欧盟和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实践及其成效进行了阶段性追踪与比较。对两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基本证实了本文假设。

【关键词】 本体安全 共同安全 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
西巴尔干 地区安全

【作者简介】 王弘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卓帆，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欧国家的外交选择及中国应对研究”（22CGJ031）、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项目“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安全秩序中的角色及对大国关系的形塑（2025QY001）”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向，和平预期在全球不同地区广泛扩散，以次区域和区域一体化为代表的安全共同体得到迅猛发展，欧盟和东盟的不断扩大与合作的深化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然而，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①却陷入无休止的种族纷争与安全困境之中。作为一个由欧盟建构起来的次区域概念，西巴尔干自诞生起就隐含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和规范性色彩。在巴里·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巴尔干被视为欧洲之下的次级复合体。巴尔干地区的安全问题既有扩溢效应，也是对欧洲安全共同体的威胁^②。除欧盟外，联合国、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与美国、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国家行为体都以其安全理念及治理规范塑造或影响着巴尔干地区的安全秩序。从巴尔干地区历史进程看，地区安全秩序的走向深受国际体系变革的制约。从维也纳体系衰落到俾斯麦大陆同盟体系的形成，守成霸权与新兴霸权实力此消彼长，使得巴尔干地区的安全秩序日趋复杂，涉及的地缘政治行为体更加多元。19世纪以来，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巴尔干联合的思想开始萌芽，一批巴尔干国家相继获得主权独立机会，在外部共同威胁作用下，走上了联合发展之路。南斯拉夫王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建立是各民族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突出举措。其中，在南斯拉夫王国阶段，反帝反殖民主义作为主要政治符号的认同力量超越了南斯拉夫内部不同文化、种族、政权之间的矛盾。二战爆发后，随着国际社会阵营对抗的分化组合，反帝反殖民的共同威胁被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所取代。以上两个政治符号正是西巴尔干地区安全共同体得以建构的根本动力。上述案例证明了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和经验上是可以在巴尔干地区建构起来的。然而，这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全共同体缘何在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之后

① 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是西巴尔干地区，由于西巴尔干地区与巴尔干地区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覆盖和重叠关系，在此需加以区分。前者是欧盟于1998年创造出来的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概念，特指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黑山、波黑、科索沃（地区），而后者则是一个边界动态演变的地缘政治和历史概念，其覆盖的国家范围不仅包括前六者，通常还包括东南欧地区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

②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页。

旋即陷入种族纷争的安全困境？

需要反思的是，发端于经济一体化的欧盟所产生的外溢效应，成功地培植出了欧洲认同，实现了法德和波德和解，建构了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所共享的欧盟身份，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安全共同体。而在西巴尔干地区，自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以来，以欧盟为代表的外部行为体试图复制其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模式，但未能使该地区彻底摆脱安全困境，民族主义驱动下的军事冲突周而复始。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尝试使用本体安全和共同安全两个变量，探究二者与安全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因果机理，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对强弱变化何以对地区安全共同体身份的演进或退化产生影响。在现实层面，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根源上对西巴尔干地区安全困境的生成和演化逻辑作出解释。在理论层面，既有安全共同体研究主要从外部驱动路径讨论安全共同体建立的促发条件与形成机理^①，但鲜有研究从本体视角解释地区安全共同体何以失败，而本体层面的困境恰恰也是冲突频发和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症结。有鉴于此，本文将选取欧盟和北约作为研究案例，通过过程追踪法，分析两者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安全政策实践如何影响本体安全和共同安全认同，及其对安全共同体建构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一 文献回顾

自南斯拉夫解体以来，西巴尔干地区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复杂的领土与民族问题为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埋下隐患。西巴尔干地区动荡的安全形势引发了多个行为体在该地区构建安全共同体的一系列尝试。出于地缘政治和规范扩散考虑，欧盟和北约在该地区安全共同体建构中最为活跃。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南斯拉夫解体根源的探究，转向 90 年代末期以来对巴尔干国家欧洲化和北约化进程的研究。其中，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鲜有涉及该地区安全共同体建设议题，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欧盟、德国、美国等行为

^① 〔以〕伊曼纽尔·阿德勒、〔美〕迈克尔·巴涅特主编：《安全共同体》，孙红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1 页。

体对巴尔干地区经济、政治转型的制度塑造及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博弈等议题^①。国际学界尤其是欧洲学者对上述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西巴尔干地区共同安全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层面皆有涉及，主要聚焦于欧盟和北约作为外部行为体如何通过调动各种规范或制度工具重建和传播共同安全规范。但需指出的是，鲜有研究从西巴尔干国家本体角度出发，反思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和北约的扩张性政策为何在该地区呈现出“趋而不同”的效果。

从政策性研究看，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被视为欧盟介入西巴尔干地区安全共同体建构的主要工具，欧盟在该地区安全共同体建构中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根特扬·斯卡拉认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通过解除军事团体和民众武装、改革安全部门、协助打击有组织犯罪等活动为地区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冲突爆发的风险。东扩政策可被视为一种和平建设的工具，它通过提供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为持久和平创造了必要条件，并通过促进制度和法律调整推动区域内合作^②。迈克尔·默林根同样认为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推动了共同安全价值观的规范扩散，他选取了波黑、科索沃和北马其顿^③三个案例进行研究，指出欧盟介入巴尔干安全事务同时受到规范、政治和安全混合目标的驱动^④。近年来多项研究肯定了欧盟在推动该地区安全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并指出西巴尔干正在从安全的接受者向安全的提供者转变。不过，这些研究高度集中于欧盟与西巴尔干在移民、社会治安等领域的合作，对领土争端、民族矛盾等

① 关欣、连晨超：《利益、规范与认同——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扩大政策趋势转变及原因分析》，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刘作奎：《延续与调整：欧盟对西巴尔干的国家构建政策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孔寒冰：《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互利与互动及其前景》，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徐刚：《西巴尔干“柏林进程”的进展及其前景述评》，载《欧亚经济》2020年第4期。

② Gentjan Skara, “The Role of the EU as a Peacebuilder in the Western Balkans”,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 14, No. 4, 2001, pp. 35 – 39.

③ 2018年6月12日，马其顿决定修改宪法，改国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作为希腊同意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条件。2019年1月马其顿议会和希腊议会分别通过更改国名协议，2月12日马其顿正式完成向北马其顿国名的转变。因此，本文凡是出现在2019年之前的涉及北马其顿的政策，统一使用（北）马其顿名称，此后的则统一使用北马其顿称谓。

④ Michael Merlingen, “The CSDP in the Western Balkans: From Experimental Pilot to Security Governance”, in Sven Biscop and Richard G. Whitma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uropean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45 – 148.

关键议题的探析较少^①。北约是在巴尔干地区构建安全秩序的另一主要行为体。菲利普·埃杜斯和马尔科·科瓦切维奇指出，北约在巴尔干安全动态中的角色主要分三种，分别是渗透、覆盖与治理，直接军事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地区的力量平衡与军事态势，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北约试图通过将巴尔干国家纳入国际安全网络以影响其国内安全政策，社会化与规范内化在治理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②。黛西·扎戈尔切娃着重分析了北约制度性扩张政策何以推动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和法治改革，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③。

从理论层面看，既有研究主要采用了阿德勒和巴涅特安全共同体研究的理论框架，从促发要素、生成机理（权力结构与社会学习）以及信任与身份确立三个阶段评估了欧盟和北约等外部行为体在西巴尔干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介入路径、角色扮演和政策目标。与政策研究相似，该类研究鲜有从理论批判视角探讨欧盟和北约在该地区的安全共同体建构缘何停滞不前。

率先使用安全共同体概念对西巴尔干地区安全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斯尔詹·武切蒂奇，他在 21 世纪初将 1999 年欧盟主持制定的《东南欧稳定公约》视为欧盟在巴尔干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初步尝试。武切蒂奇指出，《东南欧稳定条约》并非巴尔干国家对话的产物，而是体现了作为外部主要行为体的欧盟的意志，其运作方式参考了欧安会的组织形式，试图在巴尔干半岛推广共同安全的理念和规范^④。艾米利安·卡瓦爾斯基主要关注安全共同体如何发起，他将欧盟与

① Jelka Klemenc *et al.*,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Rrevisited: The Western Balkans as the Future Security Provider”, *European Security*, Vol. 30, No. 2, 2021, pp. 285 – 304; Michael Merlingen, “The CSDP in the Western Balkans: From Experimental Pilot to Security Governance”, in Sven Biscop and Richard G. Whitma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uropean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41 – 154; Donika Emini and Donika Marku, “Rethinking Security: Western Balkans as a Security Provider”. https://www.balkanfund.org/site/pubs/uploads/publications/think%20and%20link/Rethinking_security_Western_Balk.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8 月 14 日。

② Filip Ejdus and Marko Kovacëvic, “Penetration, Overlay, Governmentality: The Evolving Role of NATO in the Western Balkan Security Dynamics”,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3, No. 5, 2019, pp. 576 – 577.

③ Dessie Zagorcheva, “NATO Enlargement and Security in the Balkans”, *Journal of Regional Security*, Vol. 7, No. 1, 2012, pp. 10 – 11.

④ Srdjan Vucetic, “The 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 as a Security Community – Building Institution”, *South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p. 131 – 132.

北约的实践视为已有地区秩序的扩张，认为巴尔干并不涉及单独的地区秩序模式，欧盟和北约更倾向于将该地区纳入欧洲和平区^①。与上述研究稍有不同，苏泽特·格里洛特和瓦莱丽·德曼将研究转向西巴尔干地区，同时对安全共同体的促发因素作了补充。他们认可欧盟和北约在西巴尔干国家安全共同体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提出这一过程最初是通过推动单独国家的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直到2005年，区域合作的主张才得到更多重视^②。

二 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

“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的概念最初由理查德·范·瓦吉恩于1952年提出，他指出安全共同体是“已经实现一体化的国家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其中一体化意味着具有共同意识，并且伴随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与实践，有足够强大与广泛的能力保障和平变革”^③。卡尔·多伊奇推动安全共同体研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一项正式的研究议题。他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一个紧密融合的群体，其中紧密融合意味着群体内确立的相关制度和实践，使人们对和平变革有着长久的可靠预期。群体内的人们确信共同体成员之间不会诉诸战争，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此外，多伊奇还将安全共同体划分为两种类型：合并型（Amalgamation）和多元型（Pluralistic）。前者意指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组合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后者是在保持彼此政府合法独立地位的基础上，通过非合并形式形成的一个安全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最终走向分离或内战，则其是不成功的，反之则意味着该共同体实现了内部融合^④。

“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概念起源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强

① Emilian Kavalski, *Extending the European Security Community: Constructing Peace in the Balkans*,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p. 8 – 10.

② Suzette Grillot *et al.*, “Developing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The Role of the EU and NA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7, No. 1, 2010, pp. 73 – 82.

③ Richard Van Wagenen,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ield: Some Notes on a Possible Focus*, Princeton: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rl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1952, pp. 10 – 11.

④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 – 6.

调基于文化认同的身份安全，它的反面是本体不安全，即对身份遭受侵蚀的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甚至是恐惧感^①。美国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 1933 年就提出了与本体安全相对的“本体不安全感”假设。他在其代表作《世界政治与个体的不安全感》中，将不安全感界定为“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人们丧失对传统权威或价值的认同，个体被剥夺了人身安全感且缺乏归属感，这种情况导致了大众的普遍性焦虑”^②。直接对本体安全概念给出定义的代表性学者是安东尼·吉登斯，他将本体安全定义为“事件的连续性和秩序感”^③，反映的是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的信心。换句话说，本体安全的概念通常是指“一种身份安全，即对自己是谁的主观感觉，并成为塑造一个人的行动和选择的主要驱动力”^④。随着 20 世纪末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本体安全理论得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应用基于对国家的拟人化假设。詹妮弗·米岑指出：“国家如同个体一般，也需要在自我存在或身份认同上感到安全，原因是国家需要稳定的认知环境。”^⑤

关于“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1982 年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发布的报告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概念，该报告指出，“各国不能再以牺牲彼此利益的方式来谋求安全，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获得安全保障”^⑥。共同安全描述的是国家间在安全问题上相互依存的状态，其关键是不依靠威胁他人安全实现可持续的安全，重视国家共有的责任，它强调依靠外交、谈判、调解和其他形式解决冲突。易与共同安全产生

① 王弘毅：《本体安全与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以欧洲难民危机为例》，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4 期。

②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王菲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 页。

③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243.

④ Jennifer Mitzen, “Anchoring Europe’s Civilizing Identity: Habits, Capabilitie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 2006, p. 272.

⑤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 342.

⑥ William Fox, “Common Security: A Programme for Disarmament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Olof Palme”, *Worldview*, Vol. 25, No. 11, 1982, pp. 24–26.

混淆的是“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集体安全通常被用来指代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强调以集体的优势制止战争和侵略行为。共同安全与集体安全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相较于集体安全对具体机制的关注，共同安全更关注一组行为体的安全理念与相互依存状态；其次，集体安全具有显著的边界，边界外部的安全问题无法受到集体安全机制的保护，而共同安全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构想，它并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组织内部；再次，集体安全常要求机制内的国家共同面对外部威胁，如《北大西洋公约》提出“对一个国家的进攻是对所有国家的进攻”^①，而共同安全除外部威胁更强调一组国家内部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

（二）理论假设

巴尔干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并非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事实上，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实践在巴尔干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首先作为巴尔干联合思想的重要内涵得以发展，对共同威胁的感知是联合思想发展的动因：对帝国威胁的恐惧与对民族独立的渴望推动了18世纪到19世纪末巴尔干革命民主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不同形式的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封建王朝与资本主义政权的压迫则促进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共产党人建立联盟的尝试^②。南部斯拉夫联合的构想在巴尔干获得了阶段性成功。它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克罗地亚人主导的伊利里亚运动（Illyrian Movement）与塞尔维亚人提出的南部斯拉夫人统一计划，二者依然与帝国的威胁（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和民族独立性密切相关。在安全研究视角下，1918~1941年存在的南斯拉夫王国^③与1945~1992年存在的南联邦^④都应被视为多伊奇定义下的合并型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在两个南斯拉夫存续的70年间，团结与联合的期待始终伴随着对独立民族身份的追求，各民族始终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中。在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带来的意识形态真空中，对本体存在的焦虑最终导致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与激烈的内战，各民族纷纷建立

^①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访问时间：2025年8月18日。

^② 徐刚：《巴尔干联邦计划研究（1944~1948）：以保南联邦为中心》，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4期。

^③ 第一南斯拉夫成立之初正式国名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后于19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④ 根据1946年宪法，第二南斯拉夫最初的正式国名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独立的国家，并重新构建自身政治符号与国家叙事。同时，一系列惨烈的战争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使和解与合作变得尤为困难。

一个有趣且深刻的问题是曾经有过安全共同体经历的西巴尔干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和平规范广为扩散的时代里，却陷入种族纷争、相互仇视的安全困境。欧盟和北约作为“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实践与扩散者，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西巴尔干之外的中东欧次区域“攻城略地”，却在西巴尔干地区停滞不前。既有研究往往视民族利益诉求与具体的领土争端为西巴尔干地区根本性分歧。本文认可上述因素在当今天西巴尔干政治中的影响，但历史经验表明，西巴尔干各国对安全共同体及其他形式联合的考量超出了现实利益的范畴，具体政治与安全议题背后的认同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它不仅放大了实体安全引发的焦虑，并且使相关叙事成为民族与国家身份的核心，进而塑造国家间的政治认知。为解释上述现象和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假设 1：在自体安全身份与共同安全身份相一致的条件下，不论自体安全焦虑程度如何，国家在面对共同安全威胁时，倾向于支持通过安全共同体倡导下的合作安全机制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

假设 2：在自体安全身份与共同安全身份相冲突的条件下，当共同安全焦虑压倒自体安全焦虑，国家在面对共同安全威胁时，倾向于支持通过安全共同体倡导下的合作安全机制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

假设 3：在自体安全身份与共同安全身份相冲突的条件下，当自体安全焦虑压倒共同安全焦虑，国家往往以维持和捍卫稳定的民族身份认同为优先选项，搁置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议程，甚至不惜诉诸战争。

（三）概念操作化

如上文所述，除现实政治考量外，身份认同对西巴尔干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共同安全身份与自体安全身份之间的关系。本文采取定性研究方法探析二者在安全共同体建构的不同时期的表征及其互动模式。为便于衡量和评估自体安全与共同安全焦虑的强弱变化，下文对其进行指标化处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政治精英在上述两个指标中认同程度的变化，但考虑到民众支持程度对政治决策的间接作用，本文同时选取了部分国家民调数据作为辅证。

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主导西巴尔干地区的政治符号，因

此，本体安全焦虑程度的直接衡量指标是政治精英对民族身份遭受侵蚀、地位遭受削弱而产生的集体恐惧或焦虑感。这一指标既包含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存在主体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维护民族利益的诉求，也涵盖复杂的跨界民族主义认同与声援问题。尽管“使本民族的所有成员生活在同一国家”^①的民族理想在当下难以实现，但这种诉求却使散居在多个政治共同体内的同一民族成员具有超越政治边界的情感认同，进而使得少数民族事务往往也被其母国纳入到自身的政治议程中。当某一民族成员的集体地位或集体身份受到损害或削弱，该民族内部往往产生恐惧或焦虑感。这种焦虑感通过以下三个二级指标得以反映：对国家独立身份受到削弱的焦虑、对国家核心叙事受到侵蚀的焦虑、对与民族身份稳定性密切相关的物质环境受到冲击的焦虑^②。上述焦虑感又以政治精英为载体，通过排斥情绪得以抒发。按照定类变量划分的话，精英排斥情绪主要分为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两类；前者体现在精英对相关事件表达愤怒的态度，后者往往具有谅解、尊重、承认等取向。政治精英对本体安全的焦虑程度越高，对共同安全的支持程度就越低。

共同安全焦虑的强弱主要体现在政治精英对围绕地区安全事务所建立的共同规范、协议以及制度安排的集体意愿程度。政治精英对维护地区安全规范的集体意愿越强，对安全共同体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历史上西巴尔干国家的安全实践显示，共同安全的构想往往建立在对共同威胁的感知之上，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存在超越区域内国家间的安全利益分歧的共同威胁及其威胁程度这一指标，衡量各国政治精英发展共同安全身份的集体意愿。西巴尔干地区存在的共同安全威胁程度越高，政治精英对建立地区安全规范和制度框架的集体意愿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三 欧盟在西巴尔干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实践与效果

冷战结束以来，西巴尔干在欧盟周边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欧盟多次试

^① Ilija Garašanin, “Nacertanije”. https://www.rastko.rs/istorija/garasanin_nacertanije.html, 访问时间：2024年9月18日。

^② Filip Ejdus, *Crisis and Ontological Insecurity: Serbia's Anxiety over Kosovo's Secess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 25.

图建立区域安全体制,提出区域安全倡议,以维持地区稳定、预防冲突的发生,其基础是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及安全领域的权力让渡。同时,欧盟的实践也应放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欧盟在建构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尝试诉诸规范性力量,促进巴尔干国家在经济、政治、司法等领域的改革,培植共同安全观念,这些实践也为西巴尔干国家向欧盟靠拢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案例表明,欧盟的共同安全观念建构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在本体安全身份与共同安全身份相互冲突时,若本体安全焦虑压倒共同安全焦虑,西巴尔干地区建立起来的脆弱信任很快便会走向破裂。

(一) 阶段 1:《东南欧稳定公约》与西巴尔干安全共同体建构(1999~2008 年)

《东南欧稳定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最早的安全实践之一。公约提出的背景是在 1999 年科索沃战争后,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均意识到,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影响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暗雷。在 1999 年的欧盟萨拉热窝峰会上,欧盟、欧安组织与西巴尔干各国就欧盟发起的《东南欧稳定公约》的宗旨和原则达成了共识,并发表了“萨拉热窝峰会宣言”^①。宣言强调并重申“与会各方决心共同努力,全面实现公约所承诺的民主、尊重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加强安全的目标,最终建立一个共同、繁荣和安全的未来”^②。从形式上看,公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欧安组织的活动方式,本质上并未设立严密的组织结构,它建立了以四个工作组为主的体系,分别处理民主化转型、经济重建以及安全等三个领域的问题,并促进区域协调^③。在传统安全方面,公约推动了一系列倡议的发起,涉及武器运输与有组织犯罪等方面,但并未对各国形成有效约束。此外,公约体现了欧盟通过推动更广泛的社会改革促进互信和集体身份形成的意图。

在《东南欧稳定公约》的政策作用下,各国政治精英在这一阶段对共同安全实践表现出了较强的意愿,对本体安全的重视暂时让位于对共同安全威胁的应

① 此次峰会及其达成的宣言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缺陷,原因是欧盟以米洛舍维奇的威权统治和科索沃战争影响为由没有邀请南斯拉夫联盟出席此次会议。

② “Sarajevo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reliefweb.int/report/serbia/sarajevo-summit-declaration>,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1 日。

③ Srdjan Vucetic, “The 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 as a Security Community – Building Institution”, *South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 No. 2, 2001, p. 114.

对。1999 年西巴尔干各国（除南斯拉夫联盟外）在萨拉热窝发表声明，宣布“将致力于地区政治和经济改革、加强地区安全，克服近十年来困扰东南欧的悲剧，支持代顿协议和科索沃和平进程”^①。随着米洛舍维奇的下台，南联盟也转变了自身的政策导向。2002 年南联盟总统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与前南联邦国家领导人会晤，认可缺乏协调为有组织跨境犯罪创造了有利条件，并表示“将持续致力于解决难民和战争移民等问题，与地区各国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②。21 世纪初西巴尔干各国构建安全共同体的集体意愿还体现在冲突解决中。在波黑问题上，各方均将《代顿协议》视为波黑政治稳定的基础，积极通过官方致歉、与国际法庭合作等方式促进国家间与波黑各民族间的和解。在 2001 年爆发的（北）马其顿武装冲突中，各方仍保持着相对克制的态度，如阿尔巴尼亚总统雷杰普·迈达尼呼吁（北）马其顿官方与阿族起义军以对话方式结束冲突，称“该地区人民已厌倦战争，战争可能会威胁西巴尔干地区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目标”^③，并表示阿尔巴尼亚国内不支持（北）马其顿内部的武装势力。科什图尼察认为“（北）马其顿问题是当前巴尔干和平与稳定最大的威胁”，并强调通过对话方式消除误解^④。上述表述均表明该时期的西巴尔干领导人普遍将地区冲突和政治不稳定视为共同安全威胁，形成了建构共同安全的初步意愿。

（二）阶段 2：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稳定与联系协议》与西巴尔干安全共同体建构（2003 ~ 2018 年）

自 2003 年起，欧盟开始通过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西巴尔干部署一系列行动，作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其行动范围涵盖与欧盟安全有关的所

① “Sarajevo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reliefweb.int/report/serbia/sarajevo-summit-declaration>,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6 日。

② “Balkan Presidents Hold Landmark Sarajevo Summit”. <https://reliefweb.int/report/bosnia-and-herzegovina/balkan-presidents-hold-landmark-sarajevo-summit>,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6 日。

③ “Albanian Leader Wants End to Macedonia Fighting”. <https://edition.cnn.com/2001/WORLD/europe/03/23/meidani.intv/>,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4 日。

④ “Kostunica: Razgovori o ekstremizmu u Makedoniji”. https://www.b92.net/o/info/vesti/index?yyyy=2001&mm=06&dd=09&nav_category=1&nav_id=26481&version=amp,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6 日。

有问题，旨在维持和平、预防冲突，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加强国际安全^①。迄今为止，欧盟已通过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西巴尔干部署了六项行动，其中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与驻波黑军队的任务仍在进行中（见表 1）。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聚焦于安全问题本身，其核心任务在于预防冲突与冲突后的维稳，因此将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民族问题最为尖锐、爆发冲突可能性最高的波黑、（北）马其顿和科索沃。民事行动则高度聚焦于警务、司法等与地区社会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欧盟试图通过推动这些领域的规范化趋同，提高西巴尔干国家处理国内问题的能力，同时防止有关部门被用于某些政治目的，成为冲突的主体。本质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引领的一系列实践并非严格的区域性倡议，但它在缓和民族间矛盾、推动国家机构的合规化以降低冲突风险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表 1 欧盟通过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西巴尔干部署的相关行动

项目名称	目的	类型	开始时间	状态
欧盟驻波黑警察特派团	建立可持续、专业化与多民族的警察部队，协助当地警察打击大规模犯罪并实施改革	民事	2003 年	2012 年结束
欧盟在（北）马其顿的军事行动	为《奥赫里德协定》的实施营造稳定、安全的环境	军事	2003 年	2003 年结束
欧盟驻（北）马其顿警察特派团	监督与指导（北）马其顿法治秩序的巩固，帮助在警察与民众之间建立信任	民事	2003 年	2005 年结束
欧盟驻（北）马其顿警察咨询小组	支持（北）马其顿根据欧洲警务标准发展高效、专业的警察服务	民事	2005 年	2006 年结束
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	维持联合国 1244 号决议中所设想的国际关系现状	民事	2008 年	进行中
欧盟驻波黑军队	确保《代顿协定》顺利实施，协助当局执行军事任务（如扫雷与控制低空空域）	军事	2008 年	进行中

数据来源：根据欧盟对外关系行动署官网相关信息整理，https://www.eeas.europa.eu/_en，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6 日。

与此同时，西巴尔干地区的安全问题逐步被纳入到一体化问题中，利用入盟前谈判与一系列协议的签署与援助，欧盟试图推动西巴尔干国家制度与组织机构的改革，为各国的安全合作提供组织基础，并推动社会学习的进程，这体现了欧

^①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202/13, June 7, 2016, pp. 30 – 39.

盟规范性力量的长期建构作用^①。民族间关系正常化与区域合作的发展也同样以正式条文形式被纳入入盟前的改革任务中，在欧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欧盟试图建立国家间协调对话的平台，进一步促进集体认同的形成。

在 2003 年召开的塞萨洛尼基峰会上，欧盟明确表示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稳定与联系进程是欧盟在该地区推动入盟进程的第一个抓手，也是欧盟在该地区建构共同安全观念的第二个代表性政策实践。推进稳定与联系进程的制度工具是《稳定与联系协议》。该协议要求各国推动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改革以换取欧盟的政策、财政和技术支持。另一更有力的规范举措是入盟前谈判。稳定与联系进程和入盟谈判对安全共同体建构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二者均将“条件性”作为推动西巴尔干国家改革的主要手段，具体内容包包括民主巩固、国家机构重组等方面，既促进了塑造集体认同所需的各国价值观趋同，也为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另一方面，民族和解与区域合作等与地区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稳定与联系协议》明确提出“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是稳定与联系进程的核心”，并在具体的区域合作章节中设置了有关政治对话、建立自由贸易区等事项的条款^②。而在入盟谈判过程中，“对外关系”与“外交、安全和防御政策”被列为正式谈判的第 30 章与第 31 章，同邻国关系正常化与合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外，对塞尔维亚而言，还存在与塞科关系正常化密切相关的第 35 章。

在这一时期，欧盟的规范性压力和趋同机制对西巴尔干地区的信任文化建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在 2010 年提及，面对当前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各国需要“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各方面统一应对”，而对地区稳定贡献最为突出的是“欧盟扩大机制”^③。尽管科索沃在 2008 年宣布独

① Gentjan Skara, “The Role of the EU as a Peacebuilder in the Western Balkans”,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 14, No. 4, 2014, p. 29.

②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of the Other Par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84/13, March 20, 2004, pp. 14–16.

③ “Opening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Milo Djukanovic at the 39th Interpol European Regional Conference”. <https://www.gov.me/en/article/96561--opening-address-by-prime-minister-milo-djukanovic-at-the-39th-interpol-european-regional-conference>, 访问时间：2024 年 8 月 6 日。

立，但亲西方的塞尔维亚总统鲍里斯·塔迪奇仍积极支持区域安全合作，他表示塞尔维亚完全致力于多边与区域合作以应对 21 世纪的安全挑战，并强调巴尔干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可逆转^①。在致力于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同时，西巴尔干领导人也强调地区内部的安全威胁，时任（北）马其顿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在联合国发言中将“尚未完全解决的双边问题”^②视为地区挑战，而在 2017 年的联合国演讲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则指出巴尔干需要共同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应是维护地区和平安定^③。西巴尔干主流政治精英所使用的政治话语显示共同安全已成为各国重要的政治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价值观传递的结果。

然而随着转型不断深入，西巴尔干国家对自身身份受损的担忧也逐渐产生，各国对本体安全的焦虑使其在这一时期无法建立深度信任，共同安全的建立仅停留在浅层次。塞尔维亚的本体安全焦虑最为严重。随着 2008 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获得部分欧洲国家的支持，塞尔维亚的国内分歧迅速扩大。民调数据显示，2008 年支持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公民比例已由 2007 年的 71% 下降至 63%^④。科索沃与梅托希亚地区对塞尔维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历史上塞尔维亚东正教主教区位于该地区外，有关 1389 年科索沃战役的神话也是塞尔维亚民族建构中的核心叙事，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塞尔维亚身份稳定性得以维系的关键因素。塞尔维亚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该地区的重要性，总统塔迪奇与总理科什图尼察均“发誓将保卫科索沃”^⑤，科什图尼察更是强硬地表示只有在保留科索沃

① “Belgrade Security Forum Discusses Key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Challenges”.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78217.htm?selectedLocale=en, 访问时间：2024 年 8 月 6 日。

② “General Debate: Republic of Macedonia”. <https://gadebate.un.org/en/68/republic-north-macedonia>,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7 日。

③ “Vucic’s UN General Assembly Speech: Stability, Economy, Kosovo, EU Integration”. https://www.b92.net/o/eng/insight/pressroom?yyyy=2017&mm=09&nav_id=102376,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7 日。

④ “Istraživanja javnog mnjenja: Kosovo, mediji i strateške spoljnotopolitčke integracije”. <http://www.nspm.rs/istraživanja-javnog-mnjenja/kosovo-mediji-i-strateske-spoljnotopoliti%C4%8Dke-integracije-april-2008.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7 日。

⑤ “Serbian President Tadic Vows to Preserve Kosovo”.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AM534379/>,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7 日。

的前提下才会加入欧盟，并因欧盟向科索沃派遣代表团而中止执行《稳定与联系协定》^①。黑山的诉求在于“成为自己的主人”^②，而塞尔维亚则被视为最具威胁的他者，这促使黑山向欧盟靠拢，试图依托于欧盟建构的共同安全机制维护自身稳定。正如久卡诺维奇所说：一个“具有新的黑山身份的国家，其未来在于欧洲联合”^③。（北）马其顿同样存在严重的本体安全焦虑，特别是围绕其国名的问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北）马其顿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从外部被切断，这加强了民族主义叙事的力量。相比之下，阿尔巴尼亚承受着较少的本体安全焦虑，但科索沃问题使其与塞尔维亚的关系陷入僵局。格里洛特等人在 2013 年进行的调研则直接显示了西巴尔干集体认同建构的成果，仅有 35% 的西巴尔干国家公民认为是信任与集体感将彼此团结在一起^④。上述数据显示欧盟自 20 世纪末以来建构共同安全的工作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西巴尔干安全共同体所需的共同安全身份仍未确立起来，甚至共同安全身份在各国本体安全焦虑加剧下出现了一定的倒退趋势。

（三）阶段 3：欧盟—西巴尔干峰会与西巴尔干安全共同体建构（2018 年至今）

近年来，对西巴尔干共同安全体建构的关注更多地体现在欧盟为推动地区协同而提出的具体倡议中，其中最重要的是 2018 年欧盟发起的“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峰会旨在促进与西巴尔干伙伴国的对话与合作，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首届峰会在保加利亚召开。欧盟领导人就《索非亚宣言》达成一致，西巴尔干伙伴也对此表示赞同。宣言表示，“欧盟欢迎西巴尔干伙伴共同致力于欧洲的价

① “Koštunica: ‘Slanje Misije na Kosovo Znači Ukidanje SSP - a’”. <https://dnevnik.hr/vijesti/svijet/kostunica-slanje-misije-na-kosovo-znaci-ukidanje-ssp-a.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7 日。

② Corinne Deloy and Helen Levy, “After Twenty Four Years of Union with Serbia Montenegro is Independent Again”.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monitor/518-after-twenty-four-years-of-union-with-serbia-montenegro-is-independent-again>,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7 日。

③ Vlada Crne Gore, “Milo Djukanovic govor povodom 100 godina od pocetka i svjetskog rata”. <https://www.gov.me/dokumenta/7890938e-c8cd-4ee2-a52c-532da459ba9f?>,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7 日。

④ Rebecca Cruise and Suzette Grillot, “Regional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Western Balkans: A Cross -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Reg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2013, p. 15.

值观和原则，并相信在共同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纽带下，一个强大、稳定和统一的欧洲愿景将得到实现”。宣言还强调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推进地区内友好关系建设，维护地区稳定，推动相互合作。第二届峰会于 2020 年在克罗地亚举行，欧盟领导人在峰会上重申了对西巴尔干地区欧洲前景的坚定支持，并决心加大对该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支持力度，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第三届峰会，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加强政治合作成为主要议题。欧盟史无前例地敦促西巴尔干国家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保持一致，共同对俄罗斯威胁采取限制性举措^①。

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对共同安全观念的长期建构发挥了一定作用。从政治精英的表态看，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各国依旧保持着推动区域合作、建构安全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并将加入欧盟视为长期战略目标。例如，2017 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援引了塞尔维亚著名作家塞库利奇的文字：“巴尔干国家和民族同舟共济，无论存在何种差异，都需要有共同的政治理想。”^②在同年的贝尔格莱德安全论坛上，他表示“塞尔维亚将尽一切努力维护地区和平，而塞尔维亚正是巴尔干安全问题的一部分”^③。在 2021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也表达了对区域合作的支持，他特别指出“欧洲一体化不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目标，而是一个区域性的倡议”，并表示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已就加强经济合作达成共识^④。2021 年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与北马其顿共同提出“开放巴尔干”倡议（Open Balkan Initiative），尽管其本质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倡议，但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共同体意识在西巴尔干的发展。

弗洛里安·比伯指出，西巴尔干国家愿意就一体化达成一致的前提是“不触

① “Tirana Declara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60568/tirana-declaration-en.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8 月 21 日。

② “Statement of H. E. Aleksandar Vucic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https://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atements/72/rs_en.pdf?_gl=1*c0lutf*_ga*,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③ “Vucic: Serbia Will Do Everything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https://europeanwesternbalkans.com/2017/10/13/bsf-vucic-serbia-will-everything-maintain-regional-peace/>,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④ “Statement of H. E. Mr. Edi Rama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Albania at the General Debate 76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ttps://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atements/76/al_en.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4 日。

及其核心利益”^①，而西巴尔干各国的核心利益与其身份认同的一致性密切相关。从欧盟—西巴尔干峰会上的各方立场看，西巴尔干国家部分领导人的发言已充分体现共同安全观念所遭受的冲击。例如，2022 年布鲁塞尔峰会后，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领导人对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未能满足该地区的入盟愿望感到非常失望。其中，北马其顿总理迪米塔尔·科瓦切夫斯基拒绝接受在语言和身份问题上作出妥协以满足入盟条件。原因在于，多年来保加利亚一直以历史和身份问题为由阻止（北）马其顿开启欧盟谈判。保加利亚坚持认为马其顿的身份和语言起源于保加利亚，两国所赞颂的关键历史人物都起源于保加利亚^②。而这与北马其顿的本体安全诉求不符。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声援北马其顿，表达了对入盟进程停滞不前的失望。此外，2024 年 2 月一项针对西巴尔干国家（地区）的民调数据也为此提供了辅证。西巴尔干国家对西方和俄罗斯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分裂。民意调查显示，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绝大多数受访者希望本国（地区）坚定地支持欧盟和西方路线，而塞尔维亚只有 10% 的受访者持同一立场^③。

四 北约在西巴尔干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实践与效果

与欧盟不同，北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军事介入西巴尔干地区事务以来就充满争议性。北约对该地区事务的介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集中在 1992~2006 年间，北约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以军事渗透和覆盖为主，通过军事力量强制执行和平构建任务。第二阶段虽然始于 1994 年，但取得实质成效是在 2006 年之后。在此阶段，北约的安全治理方式从军事干预转向了以与西巴尔干

^① Shaun Walker, “No Time Soon: EU Dashes Membership Hopes of Balkan Stat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may/18/no-time-soon-eu-dashes-membership-hopes-of-balkan-states-enlargement-sofia-summit>,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② Sinisa Jakov Marusic, “Western Balkans Leaders Voice Frustration over EU Summit Failure”.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2/06/23/western-balkans-leaders-voice-frustration-over-eu-summit-failure/>, 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4 日。

^③ Garentina Kraja, “Poll: Western Balkan Countries Show Pro-West Trends, but Support for EU Shrinking”. <https://www.voanews.com/a/poll-western-balkan-countries-show-pro-west-trends-but-support-for-eu-shrinking/7594016.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3 日。

国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安全关系为目标的规范输出，其主要抓手是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成员国行动计划。然而，北约带有偏袒性的军事介入只是短暂平息了冲突，但并未从根源上弥合西巴尔干各主体民族间的认同裂痕，从而导致基于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本体安全焦虑长期压倒北约试图建构起来的共同安全焦虑，致使部分国家与北约推动的安全共同体身份长期相斥。

（一）阶段 1：北约军事渗透与覆盖政策与安全共同体建构（1992 ~ 2006 年）

20 世纪 90 年代波黑危机发生后，欧盟作为直接利益攸关方迅速开展危机管理，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支持，斡旋失败，这为美国主导的北约干预西巴尔干事务创造了契机。虽然在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冲突爆发之初，联合国便授权北约监督决议的执行，但此时的北约对是否介入地区外安全事务存在分歧。直到 1992 年波黑战争爆发后，北约才开始将军事部署渗透和覆盖到该地区的安全事务中。

1992 ~ 1993 年，北约参与了对禁飞区的管制。1994 年 2 月，北约飞机在禁飞行动中击落四架波黑塞族的飞机，这是北约历史上的首次作战行动，且是在《华盛顿条约》第五条所涵盖的区域之外进行的。1995 年 8 月，在波黑塞族人炮击萨拉热窝造成 43 人死亡两天后，北约发起了空袭。此次空袭使北约与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形成了统一战线，导致波黑三个交战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倾斜，削弱了波黑塞族人在地面战场上的影响力，最终说服三方达成妥协，于 1995 年 12 月 14 日签署《代顿和平协议》^①。该协定包括三个主要目标：结束敌对行动、授权军事和民事计划生效、波黑以邦联制形式维持单一制国家。该协定还使北约从联合国手中接过了领导多国部队执行维和任务的权力。

1998 年科索沃危机爆发之后，北约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渗透。1999 年 3 月 24 日，北约在未获得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发起了“盟军行动”，对南联盟本土进行了为期 78 天的轰炸，迫使南联盟撤军并签署《库马诺沃协定》。北约的行动以牺牲塞尔维亚和南联盟军队为代价，间接地加强了科索沃解放军（KLA）的力量，加速了冲突结束，但其带有明显偏袒性的干预对冲突双方的民族深层和解以

^① Filip Ejdus and Marko Kovacevic, “Penetration, Overlay, Governmentality: The Evolving Role of NATO in the Western Balkan Security Dynamics”,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3, No. 5, 2019, pp. 569 – 571.

及地区和平进程并无实质性贡献，甚至埋下了无穷无尽的安全隐患^①。冲突结束后，科索沃实际上成为北约的“保护国”。根据1999年6月10日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联合国部署了科索沃特派团（UNMIK），而北约则部署了科索沃部队（KFOR）接管对该地区的军事控制^②。此后，北约拥有了在西巴尔干地区永久驻军的合法性地位，其扮演的角色也从军事渗透转向全面军事覆盖。

上述两次冲突之后，北约通过部署常驻部队进一步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在波黑，北约先后部署了“执行部队”（Implementation Force, 1995 ~ 1996 年）和“稳定部队”（Stabilisation Force, 1996 ~ 2004 年），2004 年后被欧盟部队取代。在科索沃，根据《库马诺沃协议》与联合国 1244 号决议，北约部队在科索沃永久驻扎。2001 年（北）马其顿危机后，北约部队通过“琥珀狐行动”（Operation Amber Fox, 2001 ~ 2002 年）和“盟军和谐行动”（Allied Harmony, 2002 ~ 2003 年）继续在（北）马其顿存在。北约军队的长期驻扎一方面对军备控制、武器回收等安全事务的推进有其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其凭借自身的军事威慑有效阻止了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再次发生。在波黑，北约的职责还包括维持波黑联邦与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与波黑中央政治活动的顺利进行，为国家秩序的稳定运行创造了条件。

作为一个军事性防御联盟，北约所建构的安全共同体得以存在并产生紧密认同的动力来自成员国对共同威胁认知的一致性。这种共同威胁不仅涵盖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军事安全，也包括共同体区别于他者的身份安全（价值观安全）。因此，衡量西巴尔干国家在北约塑造下的共同安全观念发展程度，取决于该地区国家对共同威胁认知的一致性。一致性越高表明他们对北约建构的共同安全身份认同程度越高。

从各国官方安全文件对威胁认知的评估看，西巴尔干各国与北约虽然存在一

① 《代顿和平协议》自签署以来就饱受批评。第一个批评集中在复杂的行政体系，协议签订后的波黑成为邦联制政体，行政权力分别由三个来自不同主体民族组成的两个政治实体轮流执政，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第二个深层隐患在于该协议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外部行为体主导下完成的，主要目标是结束战争，但并未从根源上消除冲突各方的种族仇恨，无异于饮鸩止渴。参见 Steven Keil and Anastasiia Kudlenk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20 Years after Dayton, Complexity Born of Paradox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2, No. 5, 2015, pp. 471 – 489.

②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1244”. <https://unmik.unmissions.org/united-nations-resolution-1244>,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定共识，但这种共识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或低阶政治领域。例如，政治转型困难、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灾难与转型问题、武器扩散与贩运等被西巴尔干国家视为共同面临的威胁和风险。然而，这些共同安全焦虑远不足以压倒地区国家因其跨境民族身份与地位问题所引发的本体安全焦虑。

概而言之，在涉及不同主体民族身份和地位以及领土问题时，各国间仍然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阿尔巴尼亚突出“用武力处理激进民族感情所造成的威胁”；（北）马其顿强调“民族、宗教、国家和领土对抗可能导致危机和冲突”；塞尔维亚则表示，悬而未决的复杂历史，诸如由过去战争引发的敌意与未完成的和解，以及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地区不稳定是其面临的政治威胁^①。其中，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区未来的政治地位问题依然是塞尔维亚政治威胁中的核心关切^②。以上反映了本体安全在上述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除民族问题外，类属身份遭受威胁是塞尔维亚以及南联盟内塞族人面临的第二大威胁。南斯拉夫解体后，继承其衣钵的是由前南共产党政治家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联盟，与冷战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身份相斥，因此被北约视为威胁其民主价值的异类。这一分歧成为北约军事渗透到西巴尔干地区，并着力支持科索沃和波黑以削弱塞尔维亚以及塞族人的主要动机之一。在身份冲突背景下，由于本体安全焦虑的驱动，塞尔维亚对地区其他政治共同体内部塞族人的身份与地位遭受削弱的政治关切与敏感，与其他主体民族的本体安全焦虑陷入了无法弥合的安全困境。仅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塞科边界流血冲突就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冲突发生在 2000 年 2 月，是由 1999 年 6 月联合国通过关于支持科索沃自治决议所引发的^③。原因是此决议以伊巴尔河大桥为界将科索沃地区的米特罗维耶市镇一分为二，塞族人居住在该镇北部，北科索沃由塞尔维亚资助；另

① István Gyarmati and Darko Stancic, eds., “Study on th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Western Balkans”, Geneva Centre for the Democratic Control of Armed Forces (DCAF), 2007, pp. 33 – 34.

② Ibid., p. 32.

③ 联合国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谴责了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以及恐怖主义行为，并重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的管辖权和授权。该决议还重申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FRY）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呼吁科索沃自治。该决议授权在科索沃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部署国际民事和安全部队。该决议还确认需要立即部署国际民事和安全部队，并授权建立科索沃部队。

一边则由以阿尔巴尼亚族为主体的其他族群控制，并得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支持。导火索来自 2000 年 2 月南部特罗维耶市镇的几名警察和医生遭受袭击，从而引发了阿族人对塞族人的加倍报复，最终导致塞族爆发骚乱。驻科索沃安全部队（KFOR）、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科索沃塞族人之间陷入冲突，导致阿族死亡 7 人、塞族死亡 15 人。2004 年科索沃动乱与此成因一样。导火索源自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媒体关于三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男孩被科索沃塞族人欺辱溺亡的错误报道。此次报道直接引发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枪战，导致数百人受伤，死亡人数超过 14 人。

（二）阶段 2：北约门户开放政策与安全共同体建构（2006 年至今）

除军事行动外，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同时推行了门户开放政策，以类似于欧盟扩员中条件机制的方式推动西巴尔干各国政治身份、安全观念和军事体制改革。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安全关系。与中东欧地区其他前苏东国家一样，北约实行了三步走战略规划，相继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行动计划和北约成员国身份路径，逐步塑造地区内国家对欧洲一大西洋安全共同体身份的认同，旨在将该地区国家悉数纳入安全共同体之中。在加入北约的条件中，除安全部门改革外，区域内国家关系也被重点强调，例如克罗地亚、（北）马其顿都曾因与邻国争端而推迟了加入北约的日期。西巴尔干国家全部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时间是在 2006 年，因此本文将 2006 年作为北约同西巴尔干国家安全制度化合作的新阶段起点。

表 2 西巴尔干各国（地区）加入北约主导下各类机制或组织的时间表

国家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成员行动计划	加入北约
阿尔巴尼亚	1994 年 2 月 23 日	1999 年 4 月 24 日	2009 年 4 月 1 日
波黑	2006 年 12 月 14 日	2018 年 12 月 5 日	—
（北）马其顿	1995 年 11 月 15 日	1999 年 4 月 19 日	2020 年 3 月 27 日
黑山	2006 年 12 月 14 日	2009 年 12 月 4 日	2017 年 6 月 5 日
塞尔维亚	2006 年 12 月 14 日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数据整理自制。

2006 年至今，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的主要政策实践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继与阿尔巴尼亚、波黑、（北）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签署成员国行动计划；第二阶段则是在成员国行动计划基础上，开启加入北约谈判，并按照北约的

软规范和硬制度标准，在逐步完成所有准入要求后成为北约成员国。加入北约也意味着将成为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一部分。其中，成员行动计划（MAP）是北约根据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的特定需求而制定的建议、援助和实际支持计划。根据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决定，各国将通过提交各自的年度计划来加入 MAP。这些计划涵盖政治、经济、国防、资源、安全和法律方面。MAP 流程为候选国计划的开展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坦诚的反馈机制^①。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类似，MAP 也遵循自我差异化原则：候选国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其国家的优先事项，设定自己的目标、指标和工作时间表。这些计划将由候选国每年更新。作为指导和反馈，北约将组织各个领域的军事和民事专家举行研讨会，对各候选国提交的年度进展报告进行评估，并指出问题，给出改进意见^②。

围绕以上制度框架，北约与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的各国围绕协同作战能力建设、国防和安全部门改革、民事合作以及安全相关的科学合作等具体领域开展活动，逐步塑造国防安全理念、制度以及作战能力。由于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对加入北约的积极性并不一致，北约在该地区实施差序和个性化合作策略。高度亲西方的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早在 1999 年就已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因此，北约在 2006 年南联盟解体之后的西巴尔干安全政策主要针对塞尔维亚、黑山和波黑等国。

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下，北约在西巴尔干地区扩散安全规范的一个旗舰项目是于 2006 年启动的“科学促进和平与安全计划（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Program, SPS）”，该计划致力于加强北约与其伙伴国家在涉及共同利益的事务方面的非军事性合作。该计划聚焦领域包括反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网络防御、环境安全、高技术相关安全、边界安全、人文和社会层面的安全等^③。其主要运作方式是通过为量身定制的相关安全活动提供资金、专家建议和支持，促进北约成员国和北约伙伴国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合作。该计划的显著特点是，要获得 SPS 支持，任何申请都必须由至少一个北约成员国和一个伙

① “Membership Action Plan (MAP)”.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37356.htm,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② “Macedonia and the Membership Action Plan (MAP)”. <https://mod.gov.mk/action-plan/>,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③ “Develop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through Science”. <https://www.nato.int/science/country-fliers/BIH.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伴国家的项目主管共同制定。申请还必须直接解决至少一个 SPS 关键优先事项，并与安全有明确联系。在网络防御领域，SPS 活动正在增强伙伴国的网络防御意识，推动能力建设以及研究和开发。2018 ~ 2021 年间，SPS 为 440 多名网络防御专家举办了量身定制的网络防御高级培训课程，其中包括来自（北）马其顿的专家，为其加入北约作准备。在危机管理领域，SPS 和美国国土安全部支持西巴尔干地区名为“下一代事故指挥系统（NICS）”的多年期区域倡议。这一旗舰项目开发并实施了一套系统，以促进自然灾害和其他事件期间急救人员之间的协调，改善了整个西巴尔干地区的民事应急管理^①。

除此之外，北约还通过欧洲—大西洋灾害响应协调中心（EADRCC）发展与西巴尔干伙伴国家共同应对灾害的能力。北约还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7 年在（北）马其顿斯科普里设立公共事务区域中心、在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设立国防培训中心，其主要职能是开展北约合作伙伴培训和教育。

通过上述制度化合作，北约虽然成功将阿尔巴尼亚、黑山和北马其顿纳入到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之中，但从西巴尔干国家对地区内安全威胁来源认知看，北约自 2006 年以来的共同安全身份建构政策在整体上仍然是失败的。原因是自 2006 年至今，西巴尔干国家（地区）与北约威胁认知的共识程度不仅并未提升，反而更加分化。由于种族身份、文化归属、历史创伤的差异性，该地区国家对“欧洲—大西洋安全共同体”集体身份认同自 21 世纪初期以来就分裂成三大阵营：以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为代表的坚定亲北约派，以（北）马其顿和黑山为代表的亲北约但兼顾俄罗斯的徘徊派，最后是亲俄但兼顾北约的平衡派塞尔维亚和波黑。

两项指标能够为此提供佐证，其一是各国对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态度。美国共和党研究所（IRI）资助的一项调查^②显示，2023 年北马其顿 52% 的人支持加入北约，与 2022 年相比有所增加；波黑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占比为 50%，与 2022 年相比略有下降；黑山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占比为 39%，与 2022 年相比下降了

^① “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Programm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85373.htm,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6 日。

^② 该项调查由独立新闻网站机构 The Geopost 承担，在 2024 年 2 ~ 3 月间进行。该机构成立于 2021 年，由美国驻科索沃大使馆资助，其对外宣称的目标是连接西巴尔干地区，共同应对虚假信息 and 外国影响。

2%；而塞尔维亚只有 3% 的人希望加入北约^①。在 2007 年前后，塞尔维亚支持加入北约的人数占比为 18%^②；同期在阿尔巴尼亚的支持率一度超过 90%^③。（北）马其顿的支持率（2008 年）为 82%，如果必须以修改国名为代价，公众支持率则只有 30%^④。这体现出本体安全对该国安全的重要意义。从数据增减比较看，各国对北约身份的支持程度总体较 2007 年前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侧面反映出共同安全身份相比于本体安全身份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其二是对北约所建构的共同安全威胁的态度，各国对主要威胁来源的分化程度较高，对地区整体安全发展趋势总体呈悲观态度。其中，在当前各国对地区最大威胁来源方面，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波黑认为塞尔维亚是最大威胁，而北马其顿认为保加利亚是最大威胁，塞尔维亚和黑山则认为美国是更大威胁。在阿尔巴尼亚仅 32%、黑山仅 17%、波黑仅 15%、北马其顿仅 12% 和科索沃仅 8% 的受访者将俄罗斯视为威胁^⑤。除阿尔巴尼亚外，各国均认为领土冲突、邻国甚至北约带来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⑥。

此外，各国近年来发布的安全战略文件对威胁来源的认定也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涉及跨界民族身份与地位的本体安全议题上。阿尔巴尼亚 2024 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显示，阿尔巴尼亚将与欧盟和北约立场保持一致，在北约和欧盟参与下深化地区合作，其将主要威胁定义为“能源安全、外部势力的恶意影响以及

① “Between the West and Russia: The Dangerous Crossroads of the Western Balkans”. <https://thegeopost.com/en/news/between-the-west-and-russia/>,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6 日。

② “How Far Is NATO from the Western Balkans?”. https://www.files.ethz.ch/isn/43766/5_2007.pdf, 访问时间: 2024 年 8 月 21 日。

③ Albert Rakipi, ed., “Albania and NATO: Why We Do Need NATO”. <https://www.aiis-albania.org/sites/default/files/Albania%20and%20NATO%20-%20Why%20do%20we%20need%20NATO.pdf>, 访问时间: 2024 年 8 月 21 日。

④ “Macedonians Hugely Oppose Name Change for NATO Entry – Pol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005222742/http://english.capital.gr/news.asp?id=578168&catid=&subcat=&spcatid=&djcetid=90>,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6 日。

⑤ “Between the West and Russia: The Dangerous Crossroads of the Western Balkans”. <https://thegeopost.com/en/news/between-the-west-and-russia/>,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6 日。

⑥ Harrison Weinberg, “IRI 2024 Western Balkans Poll”. <https://www.iri.org/resources/western-balkans-regional-poll-february-march-2024-full/>,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6 日。

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①。北马其顿 2020 版国家安全战略将维护北马其顿及其邻国和平、安全与发展，促进东南欧地区和平与稳定作为首要安全目标。但与此同时，北马其顿认为西巴尔干地区关系依然敏感，民族、宗教、文化差异以及国家利益冲突仍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②。黑山和塞尔维亚与前者有所不同。两国安全战略目标除提及地区稳定与和平外，还特别强调了民族文化、宗教、历史与认同的安全重要性^③。在主要安全威胁问题上，黑山 2018 版安全战略文件仍然将恐怖主义、民族极端主义、武器扩散、有组织犯罪等视为主要威胁^④，与 21 世纪初期的安全威胁定位并无差异。与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不同的是，塞尔维亚的安全威胁认知并未向北约建构的共同安全威胁靠拢。塞尔维亚 2021 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对主要威胁内容表述如下：分裂主义势力，主要表现在科索沃自治省单方面宣布独立；武装叛乱，主要威胁为科索沃的极端主义团体；来自外国的颠覆性政治宣传^⑤。

结 语

北约和欧盟权力基础和特质不同，这决定了两者在西巴尔干地区扩展“欧洲—

①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Albania,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Albania (2024), 2024, pp. 2 – 37.

②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 Defenc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North Macedonia, 2020, pp. 3 – 19.

③ 以黑山为例，种族和宗教分歧仍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根据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44% 的黑山居民自称是黑山人，28% 为塞尔维亚人，8% 为波斯尼亚人，5% 为阿尔巴尼亚人，0.8% 为克罗地亚人，3% 称自己的国籍为“穆斯林”。尽管该国宪法规定该国官方语言为黑山语，但只有 36% 的居民称他们会说黑山语，而 42% 的人表示塞尔维亚语是该国的官方语言，2% 的人认为自己所说的是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语。5% 的黑山公民使用阿尔巴尼亚语和波斯尼亚语。黑山 72% 的居民是东正教基督徒，属于塞尔维亚东正教的黑山大主教区和滨海区（MML）。这种复杂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结构使其本体安全深受塞尔维亚影响。参见 Łukasz Kobeszko, “Growing Pains. Montenegro after 16 Years of Independence”.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22-10-31/growing-pains-montenegro-after-16-years-independence>,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8 日。

④ Skupština Crne Gore, Strategija Nacionalne Bezbednosti Crne Gore, 2018, pp. 2 – 21.

⑤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2021, pp. 11 – 70.

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路径不同。前者的实现方式主要是以军事力量为载体，通过建构共同威胁，推动集体安全机制扩大，并辅之以民事力量（如安全培训与教育等）建构集体身份。后者则以民事力量（规范性权力）为载体，通过构建合作网络，传播安全规范，辅之以军事力量，以打击犯罪、监督安全合作协议、提供安全指导与培训为主要目标。两者殊途同归。

从两个案例的过程追踪与比较看，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均得到了验证。可以发现，在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执行《东南欧稳定公约》阶段（1999 ~ 2003 年），刚刚经历过剧烈冲突的地区国家在应对地区内种族纷争、政治不稳定等严峻的共同威胁方面显得更为迫切。在共同安全焦虑的优先性高于本体安全焦虑的背景下，地区内各国政治精英对《东南欧稳定公约》持支持态度。在第二阶段（2003 ~ 2018 年），西巴尔干地区的安全问题逐步被纳入到一体化问题中，欧盟开始通过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西巴尔干部署一系列行动，并且利用入盟前谈判与一系列协议的签署与援助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这一阶段的欧盟政策兼具民事和军事性质。在此时期，欧盟的规范性压力和趋同机制对西巴尔干地区的信任文化建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使在科索沃自治省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背景下，亲西方的时任塞总统塔迪奇仍积极支持区域安全合作，并支持欧盟主导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相反，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时任塞总理科什图尼察则对欧盟的危机管理举措大加批评。最终引发塞尔维亚本体安全焦虑的导火索是欧盟向科索沃派遣代表团，这一举动直接导致塞尔维亚中止执行《稳定与联系协定》。在欧盟东扩乏力背景下，欧盟推出了欧盟—西巴尔干峰会以促进与西巴尔干伙伴国的对话与合作。起初前两届峰会倡议及相关多边安全制度均得到各国的积极支持，但由于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欧盟敦促西巴尔干国家与欧盟采取对俄一致的限制性举措，加之 2023 年塞科冲突再起，导致本体安全焦虑再次压倒共同安全焦虑。不论是北马其顿在 2023 年布鲁塞尔峰会中关于身份认同危机的发言，还是武契奇缺席此次峰会，都显示出欧盟倡导下的共同安全身份在本体安全身份面前的脆弱性。

北约建构共同安全身份的手段与欧盟有所不同，其主要通过建构和塑造西巴尔干国家的安全观念和威胁认知，逐步改变该地区国家对北约身份的认同与支持。从北约两个阶段政策实践的追踪看，北约在第一阶段依靠军事介入强制构建和平的政策实践，以及在第二阶段转向以安全规范塑造为主的制度化合作政策，均未促成地区内国家形成压倒本体安全认同的共同安全认同。比较 2007 年和

2024 年西巴尔干各国对北约建构的共同威胁认同以及对北约身份的支持率，可以发现，在北约身份与本体安全身份冲突的条件下，当本体安全焦虑压倒共同安全焦虑时，对北约身份的支持率将转向少数。2008 年（北）马其顿的国名修改风波引发对北约支持率的暴跌证明了这一点。反过来看，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地区一直以来作为北约身份最坚定的支持者，其关键在于两者与北约身份的一致性。虽然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地区的本体安全焦虑程度长期居于高位，但并未影响两国对北约的高支持率。以上表明，北约案例同样证明了本文的三个假设。

北约尝试建构的共同安全身份对该地区多数国家的吸引力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该地区本体安全焦虑的上升。推高这些国家本体安全焦虑的“罪魁祸首”则是语言、种族、宗教等复杂多元性所引发的对于主体民族地位和身份遭受削弱的恐惧情绪。这种恐惧情绪呈现出多层次结构，在内部层面表现为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以及波黑和黑山对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恐惧，在外部层面则表现为以塞尔维亚以及北马其顿、黑山、波黑、科索沃（地区）塞族群体对北约在该地区不断渗透和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及其身份的恐惧。2006 年所有西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倡导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来，西巴尔干地区爆发的流血冲突事件并未就此终结。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塞科边境发生的有人员死亡的较大规模冲突就有三次，分别是在 2011 年、2012 年和 2023 年。其余各年份也均有小规模抗议或冲突。在部分年份，如 2019 年和 2021 年曾发生较大规模的抗议，甚至有双方军队的部署。而在波黑，2010 年、2015 年和 2017 年都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且这种冲突的导火索均来自上文所述的恐惧情绪。

一个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变量是斯拉夫文化身份和创伤记忆的裂痕。通过对北约的案例考察，可以发现西巴尔干国家对北约身份认同的分化恰好与上述两个变量存在关联性。具体而言，对北约身份在国内存在高度精英共识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地区，这两者恰好是北约在 1999 年轰炸南联盟中的扶植对象，另外两者内部的主体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也与其他以斯拉夫认同为主体的国家不同。相反，由于对北约的创伤记忆和斯拉夫身份认同，塞尔维亚、波黑塞族共和国以及黑山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俄罗斯奉行更为平衡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塞尔维亚。囿于篇幅和研究焦点所限，本文并未对上述两点展开讨论，这也是后续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地方。

（责任编辑 李中海）